两会访谈

做强实体经济夯实发展基础

——访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省长刘奇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刘 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实体经济是发展之基、富民之源，是实现稳中有进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全国两会期间，记者就如何做强实体经济话题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省长刘奇。

刘奇代表说，近年来，江西在抓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大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难题。去年，江西开展专项行动，先后出台了100条降成本优环境政策措施，以减轻企业负担。但是，企业融资难、创新难、盈利难等问题依然突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仍面临许多困难，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刘奇代表表示，江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江西工作提出的重要要求，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推进实体经济发展作出的部署，把工作做细做实，真正做强实体经济，实现更好发展。

坚持创新引领强实体。刘奇代表说，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大，越要向创新要动力；越是传统产业比重高，越要向创新要出路。把握新常态，做强实体经济，必须坚持以创新为引领，使创新成为企业“活的灵魂”。提高创新投入水平。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切实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提高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强化创新平台支撑。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打造面向社会的创新平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企业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加快建立一批科技协同创新体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搭建好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平台，增强创新的平台支撑能力。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中。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构建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创新生态链。落实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政策措施，激发科技人员创新的主动性、创造性。

聚焦重点领域强实体。刘奇代表说，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领域。所谓脱实向虚的“脱”，实际上是脱离制造业。目前，江西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0%以上，制造业仍是江西经济的主体，必须坚持做强制造业不动摇，不断提升总量、优化结构，推动中小微企业由低、散、弱向高、精、优迈进。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积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大力推动航空、新能源汽车、新型电子、智能装备等产业发展，推进个性化、定制化、柔性化制造，变“江西制造”为“江西智造”，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有色、石化、建材、纺织等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个性化方向转变。同时，实体经济还涵盖了农业、服务业中的绝大部分产业，必须着力做优农业，高度重视粮食生产能力建设，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着力做实服务业，大力发展工业设计、文化创意、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引领和保障。

着力优化环境强实体。刘奇代表说，环境竞争力决定发展竞争力。必须把各级政府抓经济工作的重心引导到抓实体经济上来，营造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让实体企业“有利可图”。同时，深化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专项行动，推进以“放管服”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拓展实体经济的盈利空间。提高精准帮扶实效。深入开展省领导挂点联系、省直部门对口帮扶、金融组团帮扶、科技专家帮扶、产业链对接帮扶等五大入企帮扶活动，提高帮扶企业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帮助实体经济排忧解难。促进资本回归实体。发挥省级产业升级引导基金撬动作用，做好“财园信贷通”“财政惠农信贷通”等工作，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流向实体经济。减少部分资金在金融系统“内循环”，切实降低投机资本的“嗜性”，使金融更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此外，还要加大本土人才培养力度，实施有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完善人才使用激励机制，吸引赣籍人才回归创业，着力建设一支高质量的企业家队伍、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大量现代制造业亟需的“能工巧匠”，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丰厚百姓民生的“里子”

——访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省长刘赐贵

本报记者 何 伟

刘赐贵

对于海南省的未来，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省长刘赐贵心中有“三大愿景”，即建设全省人民的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

把“建设全省人民的幸福家园”放在首位，可见提升“人民幸福感”在海南省委、省政府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全国首个生态示范省，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海南拥有的最大优势和生命线，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财富，也是实现持续发展的最坚实依托。”刘赐贵代表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宁愿增长慢一点，也坚决不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项目。

守着“生态宝库”就是海南人民最大的幸福，为了留住“青山绿水”，海南省委、省政府更是不遗余力。

刘赐贵代表介绍，过去一年，海南省拆除侵占耕地、林地的违章建筑870万平方米；拆除1823公里海岸线上的违章建筑25万多平方米，收回海岸带地4000多亩；实施了城市内河（湖）水污染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等。2016年，海南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9.4%，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海南已经将陆地、岸线、海域等重要生态资源作了明确的划定，‘生态红线’不再模糊不清，具体落实到了每一块土地上。”刘赐贵代表说。

保护生态环境的各项任务，海南省已经分解到各级政府。“就像跳起来摘桃子，海南各级政府要努力‘跳一跳’来完成任务，不能说了做不到，忽悠老百姓。”刘赐贵代表说。

“生态这个红线今后绝不能触碰。我们坚持生态环境只能变好，不能变差，海南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生态优势，有了生态优势，才有发展定位。”刘赐贵代表表示。

的确，海南凭借生态优势每年吸引游客超过6000万人次，“候鸟族”及过年的游客数超过200万人次。解决海南人民和游客的吃、住、行以及“候鸟”老人的医疗保健等问题成为海南省委、省政府的一件大事。

海南省委、省政府解决“高菜价”问题遵循“少找客观原因，多找主观问题”的原则。刘赐贵代表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来海南过年的“候鸟族”以及游客数量超过200万人次，海南省扩大蔬菜种植面积时，将“候鸟”和游客纳入全省人口来考虑，规划合理的种植面积、种植品种；在海口市建立320个平价菜店，覆盖主要社区，让优质蔬菜直接从地头到餐桌。

“但菜价问题永远没有过去时，百姓天天要吃菜，天天要提‘菜篮子’，所以要抓好‘菜篮子’市县长责任制，年年都让百姓在菜价上满意。”刘赐贵代表说，海南要在落实“菜十条”的基础上，构建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的机制，形成稳定的蔬菜生产、供应链。

吃得便宜、住得舒心，来海南过年的游客和“候鸟族”越来越多，他们的健康医疗保健问题让刘赐贵代表十分牵挂。

“卫生计生工作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事业，与家家户户的生活密切相关，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家都有切身体会，一个家庭有一个人生病，全家都会跟着操心，工作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刘赐贵代表说，建设全省人民的幸福家园，最基本的前提是让本地居民能够健康地生活；建设国际旅游岛，要让游客享受到便捷的医疗养生服务。

据刘赐贵代表介绍，海南已经初步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医疗卫生中心辐射全岛，基本形成了全省“1小时三级医院服务圈”格局。

“2017年，我们将继续加大民生支出投入，计划安排1002亿元，用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节能环保等民生支出，促进海南民生事业持续发展，进一步织牢加密民生保障网。”刘赐贵代表告诉记者，2017年安排的民生重点项目有40个，计划投资236亿元。

投出去的钱取得了实效。“15分钟生活圈”覆盖海口主城区；全国率先实施中职免费注册入学，就业率高达97%；301医院等顶级综合医院，眼耳鼻喉头颈、肿瘤等高水平专科医院布局海南，改写了大病出岛的历史；异地就医结算实现了省级统筹区全国覆盖……

面对这些成绩，刘赐贵代表认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建设幸福家园的最基本要求，未来还至少要达到以下水准：一是宜居，不仅要让群众住有所居，还要让群众生活得舒适、安全、温馨；二是宜业，就业程度高，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三是宜游，每个村镇都是一个景点，每个居住点都有旅游的元素；四是宜养，能养生、养心、长寿。

◁ 3月8日上午，人大上海代表团在驻地分组审查预算报告。王乃坤代表（左三）在发言。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 3月9日上午，人大河北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马誉峰代表在发言。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江苏泰州市委书记蓝绍敏代表：

大力推动应收账款融资

本报记者 薛海燕

推动应收账款融资，对于破解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抵押融资难，去除企业债务杠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阻断互保圈链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都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泰州市委书记蓝绍敏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应收账款融资增长较快，至2016年末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注册用户11.72万家，已促成融资额4.13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50%和290%。但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6年末应收账款12.6万亿元以及超过8700万户市场主体产生的巨额应收账款相比（2015年我国5000余万家小微企业拥有应收账款总资产约26万亿元），应收账款融资规模仍然偏小，融资率仍然不高。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债务确认难、信用风险高、信息不对称、法律有缺位等多个方面。

蓝绍敏代表认为，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动应收账款融资，可以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着重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以相关法律法规为重点，完善配套实施办法。二是以人行征信系统为基础，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三是以金融改革先行区为龙头，探索债权流转试点。四是以降风险促流动为目的，建立风险补偿机制。五是以重点企业为突破口，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指导企业和银行依托应收账款服务融资平台，推进银企系统直接对接、批量融资；积极推进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帮助企业盘活应收账款存量，提高市场融资效率。

“两化”融合助推智能制造

——访广西柳州市委书记郑俊康代表

本报记者 童 政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智能制造技术正日益成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主要趋势。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工业重镇和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广西柳州市如何以“两化”融合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柳州市委书记郑俊康。

“在推进‘两化’融合的进程中，我们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智能技术的引领作用，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开展智能化改造，取得了明显成效。”郑俊康代表说。

郑俊康代表认为，“两化”融合首先能显著提高“智能制造”水平。拿柳州来说，实施“两化”融合以来，以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关键技术装备得到了广泛应用，全市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4000台，机器人密度约为96.2台/万人，超过世界66台/万人及全国36台/万人；生产过程控制和制造执行系统逐步普及，大型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60%，关键工艺流程数控化率超过40%；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柳工股份等重点企业搭建了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郑俊康代表认为，“两化”融合的另一个重要成效是发展了“智能制造”新业态。首先是工业电商快速发展。柳州与阿里巴巴合作，建立了“阿里巴巴柳州产业带”；京东电商平台建立了“中国特产·柳州馆”。广西糖网构建了食糖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每年承载着全国四分之一食糖的购销和流通任务，已连续9年位居全国同类市场榜首等。其次是电商仓储物流迅速崛起。中国第三方物流实验研究基地——柳州市桂中海迅物流有限公司是广西第一家能为工业制造企业提供“一体化”供应链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和物流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物流企业，综合实力在西南地区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两化’融合还催生了‘智能制造’新模式。”郑俊康代表说，“当前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协同制造正在形成。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柳钢集团、柳工集团等龙头企业构建了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面向下游企业提供特色云制造服务，设计资源实现集聚共享，制造能力和生产资源基本实现在线发布与交易，社会化协作生产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郑俊康代表最后还认为，“两化”融合助力构建“智能制造”新生态。首先是政策助推建立“柳州制造”生态系统。其次是构建智能制造服务体系。

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马长青：

以大数据构建新型产业体系

“‘十三五’时期，贵州省明确实施大扶贫、大数据两大战略行动，大数据发展风生水起、成绩斐然。”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马长青说，贵州去年大数据核心业态企业达到39家，关联和衍生业态企业超过了800家，以大数据为引领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3200亿元。

马长青代表介绍，贵州省近年来着力营造良好发展、厚植发展沃土，相继引进了“三大运营商”、高通、华为等一批引领性企业，创立了国内首家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数据交易中心，率先出台了大数据地方性法规，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构建现代新型产业体系，促进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高度融合，实现跨越发展？马长青代表表示，要扎实抓好壮大数字经济主体产业、运用大数据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大数据催生新经济新业态等3件事情。

“我们将在构建软件服务、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上下硬功夫，进一步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促进企业产品、技术和模式创新，改善供给质量，提高供给体系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和服务化转型。”马长青代表表示，要充分挖掘大数据作为“智慧树”“钻石矿”的价值，先行先试，先试先成，为国家战略创新试验、总结经验。”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汪亚平：

依法加强高铁安全管理

截至2016年底，全国铁路运营里程达12.4万公里。高速铁路里程突破2.2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高铁已成为铁路运输骨干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高速铁路建设快速发展，安全问题不容小视。行人钻入高铁线路，沿线建筑物侵入高铁限界以及向动车组投掷异物等行为，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安全后果。尽管铁路部门始终把高铁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但由于铁路点多线长，对安全环境要求极高，特别是新形势下高铁安全面临诸多考验。为此，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铁路局局长汪亚平建议，在依法治国形势下加强高速铁路安全保障，从法律层面加强高铁安全管理。

汪亚平代表认为，高铁安全作为一个涉及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在规范铁路部门责任的同时，应该通过立法进一步理顺高铁安全管理体制机制，逐步使维护高铁安全成为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和广大社会民众共同的责任。需要进一步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对高铁安全的联防和监管责任，将高铁安全纳入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健全铁路与地方政府部门联防与综合治理机制。需要明确危及、破坏高铁安全行为的责任追溯、惩戒标准，进一步加大严厉惩戒的力度，形成有力震慑。需要通过出台地方性条例条规，落实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高铁安全宣传、教育和管理责任，健全群宣群防群治机制，并通过联合执法加强铁路安全保护区管理，净化高铁安全环境。

（本报记者 郑明桥整理）